

物的牢笼与人的解放

——“现实中的个人”及其当代回响

高昀希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6日

摘要

数字技术现今深度重塑着社会结构与人类生存方式, 个体看似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连接与自由, 实则可能陷入更为隐蔽的数字牢笼。平台算法、数据商品化与零工经济等新形态正以技术中立、效率优化之名, 编织着新的支配关系和异化景观。本文正基于这一现实关切, 回归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中的个人”这一理论原点, 在阐明了“现实中的个人”作为历史科学前提的批判性内涵、揭示其如何将历史研究从观念世界拉回到现实尘世的物质生产基础上, 进而分析这一前提如何逻辑性地推导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重新诠释从偶然性的个人到有个性个人解放路径, 并将这一方法论框架运用至数字时代新异化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中, 展示其穿透观念层面的遮蔽、把握时代本质的理论生命力。

关键词

现实中的个人, 唯物史观, 数字资本主义, 异化

The Cage of Things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Real Individual” and Its Contemporary Echoes

Yunxi Gao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 2026; accepted: June 24, 2026; published: July 6, 2026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social structures and human modes of existence. While

文章引用: 高昀希. 物的牢笼与人的解放[J]. 哲学进展, 2026, 15(7): 15-21.

DOI: 10.12677/acpp.2026.157300

individuals appear to enjoy unprecedented connectivity and freedom, they may in fact be falling into a more concealed digital cage. New formations such as platform algorithms, data commodification, and the gig economy, operating under the guise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and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are weaving new forms of domination and alienation. Grounded in this contemporary concern,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real individual” as articulated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t clarifies the cr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al individual” as the premise of historical science, revealing how this concept redirects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the world of ideas back to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of real lif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how this premise logically generates the fundamental categories of materialist historiography, includ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reinterprets the path of emancipation from the “accidental individual” to the “individual with personality,” and applies thi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a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emonstrating its theoretical vitality in penetrating conceptual obscurities and grasping the essential dynamics of our time.

Keywords

Real Individu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们现今所置身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交媒体、算法推荐、零工经济等数字技术形态承诺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连接自由与个性化体验，但在这种自由的表象之下，却潜藏着更为精密、隐蔽的支配逻辑，即我们的注意力正被量化、社交关系被商品化、劳动时间被无限延伸、自我认知被算法所塑造，然而，这样一种新型的数字牢笼的运作机制却常被技术中立、效率优化等观念叙事所遮蔽。

要穿透这层观念叙事层面的遮蔽，亟需一种能够把握时代本质的批判性理论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确立的“现实中的个人”这一历史科学前提正提供了这样一种锐利的方法论，其通过对德意志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将历史的解释权从观念的世界夺回，锚定于现实的尘世物质生产中，重访这一理论原点，不仅是对思想史的尊重，更是为了获得一种批判性的视野，继而用以剖析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与观念建构、为人的解放探寻现实路径。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脉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路径包括：以 Zuboff 为代表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揭示出平台资本全面占用及预测性地操控用户的行为数据，使得个体的在线活动就被转化为可交易的行为剩余，这个过程是在技术中立的表象下完成的[1]；以 Srnicek 为代表的平台资本主义研究剖析了平台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组织形式的运作逻辑([2], pp. 40-43)；此外，以 Fuchs 为代表的数字劳动理论将劳动价值论延伸至社交媒体与零工经济的领域，批判数字时代的剥削形式，上述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资本、平台与劳动等宏观的层面。本文则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现实中的个人”，从个体生存的境况出发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以此凸显本研究的视角([3], pp. 13-126)。

2. “现实中的个人”对抽象历史观的清算与唯物史观的奠基

(一) 思政哲学的批判——从词句斗争到现实转向

青年黑格尔派以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为代表将历史视为自我意识或唯一者等抽象性观念的演变史。尽管他们激烈地批判神学观念、旧观念，但其斗争却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从未触及到真实的现实世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则前进了一步，以感性的人去对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其所理解的人仍是脱离具体历史进程、社会关系，孤立地类存在，所以最终也只能诉诸于抽象的道德。他们的共同错误在于颠倒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将观念独立化、神秘化为历史的本质与动力，从而将真实的社会矛盾掩盖在抽象观念的建构中。

(二) 一个石破天惊的新前提——“现实中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脱离现实的历史观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阿基米德支点意义的出发点，即“现实中的个人”。这一范畴的确立是通过三重紧密关联的否定性规定完成的：第一、否定纯粹的意识主体，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p. 525)历史的起点并非是思想、观念，而是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第二、否定抽象类本质。费尔巴哈的“人”是内在的、无声的普遍性，而“现实中的个人”是从实际活动的、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501；第三、否定任意的理论预设，与从臆想、教条出发的旧哲学不同，“现实中的个人”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4], p. 519”，是每个时代都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最基本的经验事实。正如汪信砚、李志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中的个人”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入口处”，正是借助于这一概念，马克思破解了人类历史之谜，将历史研究从观念世界拉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中[5]。

(三) 历史科学的首要确定性——物质生产

从“现实中的个人”这个无可置疑的前提出发，第一个需要确认的历史事实就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这直接就引出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一论断实现了历史本体论的根本转向，即历史的根基不再是观念、精神或神意，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物质生产实践。这种生产内在地包含着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共同活动的方式。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意识的位置被重新安置“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 p. 525)

(四) 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生成逻辑

“现实中的个人”这一前提蕴含着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逻辑。首先，在需要与生产的辩证法层面，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会立即生产出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再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动力；其次，在分工所具有的关键枢纽作用层面，个人之间交往形式的发展表现为分工，分工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从部落所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演进，并指出分工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活动的固定化、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此外，在观念建构的生成与分析方法层面，只有当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社会意识形态才能获得独立化的外观，因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都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关键并不在于驳倒其观念性的内容，而在于揭示其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这能够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提供根本方法论。

3. 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的解放蓝图

在社会利益分化与固定分工的社会中，“现实中的个人”处于普遍异化状态，沦为了“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性并非是指个人命运的捉摸不定，而是其生存条件，即职业、地位、生活方式等作为一种异己、

外在的力量强加于自身，与个人的内在个性相背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所创造的社会力量聚合为统治、支配自己的物质力量，而国家则作为形式上的普遍性代表，其普遍性形式的背后折射出特定生产关系中权利与资源的非均衡配置([4], pp. 536-537)。

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性运动正是要扬弃这种异化状态，这并非基于道德愿望的空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性运动。这一运动以生产力的高度和普遍交往的形成成为物质与社会前提，前者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个体自由发展空间奠定基础，后者则使得无产阶级能够超越地域的局限，认清自身共同利益与历史使命。

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4], p. 571)。在此之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得以消除，个人在其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即随着私有制和旧式强制性分工的消灭，个人不再被束缚于特定、强加的活动范围内，从而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存条件，使社会生产力服务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至此，“偶然的个人”才能转化为“有个性的个人”([4], p. 571)，而解放的本质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对其生活条件的重新掌控。

4. 数字时代异化批判——“现实中的个人”所陷入的数字牢笼

(一) 新的隐匿剥削形式

数字时代，数据取代了土地、机器，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与核心产品。每个“现实中的个人”的数字在线轨迹，即搜索、点击、社交、消费等环节都持续性地进行着数据生产。这些数据经平台算法的加工转化为可用于精准营销、行为预测的稀缺资源，创造着巨大价值。然而，数据的生产者，用户却对自身所生产数据的所有权缺乏有效的掌控力。尽管部分用户可通过内容的生产获得一定收益，但这种收益并未建立在对数据本身的所有权之上。在此过程中，数字劳动的范畴也极大地扩展了，不仅包括程序员、内容审核员等显性的有酬劳动，更囊括了全球网民无偿进行的“玩劳动”，杨宇辰学者进一步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玩工”：一是“为了玩而从事玩劳动”的产消者，二是“为了工作而从事玩劳动”的雇佣制玩工。前者在共享劳动中实现自我满足与社交收益，后者则在人格从属与经济从属的双重关系中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6]。Fuchs 学者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将社交媒体用户的无酬内容生产界定为数字劳动，并指出平台资本通过占有用户数据与注意力资源，无偿攫取其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形式比传统雇佣劳动更为隐蔽([3], pp. 123-126)。平台资本虽不直接拥有传统的生产资料，却能通过掌控算法与协议，组织全球性的数字劳动过程，并占有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一种更具弹性、隐蔽性、全球性的剥削形态。Srniczek 学者在分析平台资本主义时就指出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架构，更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组织形态，其核心在于通过数据提取与网络效应实现垄断性利润攫取。数字劳动的全球化组织正是依托这一平台逻辑得以展开的([2], pp. 40-43)。

(二) 算法社会与固化的数字偶然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阶级社会中的个人定义为“偶然的个人”，即旧式分工与私有制使得个人的生存条件，如：职业、社会关系、发展机会等会不受自身的控制，而是被外在的社会关系、资本逻辑所支配，进而个体的发展便沦为了“偶然的”、非自主的过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算法、数据商品化和零工经济将这一“偶然性”推向了新的阶段，形成了“数字偶然性”。首先，这一阶段使支配逻辑从物质生产关系转向了算法——数据逻辑，个体的工作机会、社交关系、信息获取甚至自我认知，都由算法推荐、数据评分等数字机制所决定；其次，这个阶段偶然性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算法以个性化推荐、效率优化的名义实施着支配，个体常常会将算法的决定视为自我选择的结果；最后，此阶段的偶然性影响更具普遍性，数字技术会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个体几乎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于此，这样偶然性的支配就从个体生产领域延伸到了生活领域。

这种数字偶然性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偶然性”概念的当代延伸和重构，也是数字牢笼最核心的表现形式之一。算法不仅组织了生产，更深刻地重塑了社会交往与个人命运。对于零工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而言，算法系统通过智能调度、路径规划、实时评价与奖惩等，实现对劳动过程的严密控制，劳动者沦为算法最优解中可替换的数据点。在社交领域，算法将复杂的人际关系简化为可量化的好友数、点赞数、转发量，这使得深度交往让位于表演性的浅层互动，人们在获得虚拟连接的同时却可能陷入更深的现实性孤独中。更为关键的是，算法正在制造一种结构性的数字偶然性，即个人的教育机会、求职成功率、信贷额度乃至婚恋匹配都日益依赖于算法的评分、推荐，而这些基于历史数据和固定模式的算法，也往往会固化甚至放大已有的社会偏见与不平等，将人囚禁于由自身数据构成的数字画像牢笼之中，进而形成信息时代的新型身份固化机制。张贝、林晶学者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表现为数字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对立、同劳动过程相异化、同类本质相异化，并最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这一分析框架表明，算法的结构性与个体性的双重控制，正是数字时代异化在劳动过程与人际关系层面的具体展开[7]。

“数字偶然性”不同于传统的偶然性。首先、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偶然的个人”主要受制于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市场波动，这种偶然性虽盲目，却也为打破旧有的分工提供了可能。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算法看似客观地推荐与评分，实质上却是对个体过往的社会关系、既有偏见、不平等的数字化与自动化再生产。个体的信用评分、求职机会、社交匹配不再源于无目的的偶然，而是源于被编码的、可计算的历史，故偶然性因此也被固化为一种可预测、可干预的技术程序；其次、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人大多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与命运，但仍有通过集体行动改变外部条件的可能。在“数字偶然性”下，若算法画像一旦形成，平台便会不断推送与之匹配的信息、机会和限制，使个体越是被判定为某种类型，就越被塑造成那种类型。例如，一个被算法标记为低信用的个体，将更难获得优质的教育或工作推荐，从而更难以改变其初始状态。

(三) 从驯服到自我规训——数字观念叙事与内在规训

数字时代的主导性观念叙事精巧内嵌于技术实践之中。首先，技术中立论将算法视为纯粹的数字优化工具，掩盖了其背后设计者的价值取向、商业目标与结构性的偏见，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其次，连接一切的乌托邦用让世界更紧密的美好承诺包装了连接背后的数据提取、全景监控与商业殖民，使人们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拥抱显得自发而自然；此外，更为深刻的自我优化性的生命政治，从健身手环、睡眠监测到效率软件，一整套自我量化的技术鼓励着个体持续监测、优化自己的身体、情绪与生产力，同时，社会竞争的压力也被成功内化为个体的自律性需求，失败不再被归咎于不公的社会结构，而被归结为个人数据的不够完美或个体的努力程度不足，上述都标志着控制的逻辑已深入到个体的生命本身中，实现了从外部驯服到内部自我规训的转变。

(四) 数字空间的能动性 with 反抗幻象

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数字平台所催生的新型社群连接方式，使得边缘性群体得以通过网络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用户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数据原料，而是会通过算法对抗，如反套路点赞、信息茧房突围、数字社群互助等方式，对平台的支配进行微弱的反抗。然而，这种能动性与反抗也始终被限制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首先，用户的反抗行为本身也会被平台数据化、商品化，成为算法优化的训练数据，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的进一步控制；其次，数字社群的连接往往也是建立在算法推荐的同质化逻辑基础之上的，其难以形成突破现有生产关系的集体性力量；再者，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自由本质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性的自由，个体依然会被数据、算法和平台资本所支配，无法真正掌控自身生存条件。因此，那些积极的变化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也无法真正打破数字牢笼的结构性支配。

5. 当代解放路径——重夺数字生存控制权

李巧巧学者在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系统分析中指出，扬弃数字劳动异化需要“建立健全数字劳动法律规范与数据财产分配体系”“规范应用数字技术以限制平台垄断”“弘扬先进文化”“引导数字技术助力人类劳动解放”[8]。这一思路为重新夺回数字生存控制权提供了制度性与文化性并重的理论方向。面对数字牢笼，社会的变革路径需要新的实践形式，其核心在于重夺对数字生存条件的集体控制权。第一，要争夺数据所有权与算法民主，挑战数据属于平台的私有产权逻辑，确立起数据由生产者所有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推动算法透明化、可解释化，建立公众能够参与、监督的算法设计、审计与问责的民主机制，使算法权力受到社会的制约；第二，要积极构建数字劳动者的集体性力量。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所处于的高度原子化的状态，亟需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如跨地域、跨平台的数字工会等，利用集体谈判与行动，去对抗算法的任意调度和不公定价，更进一步地探索平台合作主义的模式，即由劳动者与用户共同拥有、民主管理数字平台，使技术真正服务于社群福祉而非资本积累；第三，重建数字公共领域。对抗平台资本对公共对话的殖民，需要建设非营利性、去商品化、保障隐私与言论自由的数字化公共基础设施，这类公共数字空间应致力于促进公众理性交往、文化创造与议题讨论，而非流量的变现；第四，要积极推动技术发展的社会性转向。综上所述，解放并非是拒绝技术，而是改变驱动技术发展的社会关系与目标。整个社会应致力于将技术创新的方向从无限追求监控的精度、用户的粘性与利润的增长转向缩短个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普遍增加自由时间、赋能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必须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与民主治理，以确保技术演进与人类解放的进程相一致。

6. 作为永恒批判方法的“现实中的个人”

《德意志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并非只是一个关于“人”的静态定义，而是一种永恒的、批判性的方法论原则，即永远从具体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出发去解释社会意识形式、历史的变迁。在算法所编织的观念遮蔽的今天，这一方法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重要，这要求我们将批判的焦点从对技术本身的道德谴责转向至数字生产关系、算法权力结构、数据所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剖析，故其解放路径也需要从未来的抽象憧憬引导至数据权利、算法民主、平台治理权的切实社会斗争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p. 502)“现实中的个人”这一前提的确立正是为了服务于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实践。在数字时代，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都必须成为打破数字牢笼、将技术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历史主体。从数字偶然性的囚徒转变为在数字时代自主发展的有个性的个人，这趟解放之旅的起点与方向就是：一切从“现实中的个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中的个人”的解放。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青少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研究》(2025B3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 Affairs, 123-126.
- [2]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40-43.
- [3]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123-126.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80075>

-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汪信砚, 李志. “现实的个人”: 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人概念及其意义[J]. 哲学动态, 2007(9): 9-15.
- [6] 杨宇辰.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阈下“玩工”劳动关系的再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8): 141-151.
- [7] 张贝, 林晶.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异化、扬弃与反思[J]. 学术探索, 2026(3): 95-103.
- [8] 李巧巧. 数字劳动中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扬弃[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4): 114-125.